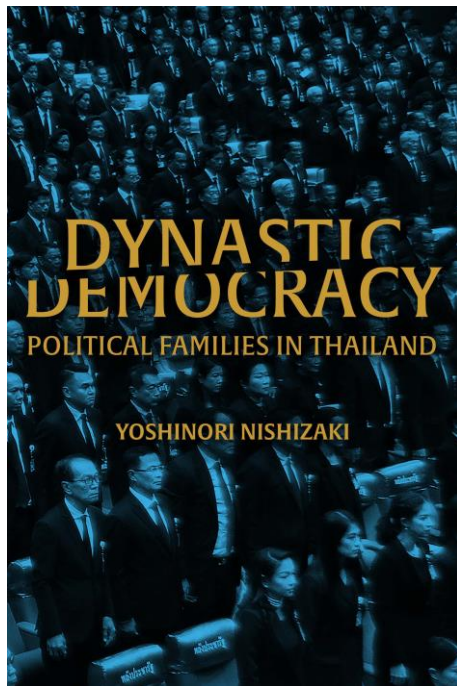


## 区域动态（东南亚）

本期分享《王朝政治：泰国的政治家族》一书，深入探讨泰国家族政治与泰国民主政治发展。

【编者按】在东南亚地区，家族往往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政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存在强大的政治家族，这些家族通常通过世袭方式将权力传递给下一代。这种现象可能对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在泰国，政治家族的影响也很显著。一些家族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拥有广泛的政治网络和资源。由于家族成员可能更倾向于在亲戚之间分配资源，而不是按照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家族政治可能使政治权力更容易滋生腐败，造成权力过于集中，政治体系缺乏竞争性。由于政治家族的势力垄断，其他政治力量可能感到排斥和不满，导致政治对抗和社会动荡。过度强大的家族政治也可能会阻碍民主发展，使政治体系缺乏真正的代表性和竞争性。

在《王朝政治：泰国的政治家族》（*Dynastic Democracy: Political Families of Thailand*）一书中，作者通过提供丰富的档案资料，对家族政治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挑战，呈现出一幅泰国政治格局的全新图景。作者认为，政治家族并非仅仅是体制的附属品，而是政治结构的本质。这一观点颠覆了以往对家族政治的理解，将其视为泰国政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这本书，我们精选了两篇书评进行分享。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办刊物《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于2023年8月发布泰国国王科技大学科技与创新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克里蒂空·翁斯旺帕尼(Kritdikorn Wongswangpani)关于《王朝民主：泰国的政治家族》的书评文章，原作者西崎义则(Yoshinori Nishizaki)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及社科学院东南亚研究系副教授。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在《王朝民主：泰国的政治家族》一书中，西崎义则提出泰国存在政治家族，而且它们非常重要。作者将“政治家族”定义为：(1)自1933年首次议会选举以来至少产生过两名议员的家族；或(2)自1933年以来仅产生过一名议员，但与同期产生过一名或多名议员的其他家庭有直接姻亲关系的家庭(原书第4页)。这扩展了大多数学者所使用的定义，后者仅将至少有两名国会议员的家庭视为政治家庭(原书第5页)。

西崎义则将政治家族分为两派：与王室相关的“贵族或官僚家族”(取决于其政治和家谱根源)以及“资本家-平民家族”。第4章和第5章论述“两派间冲突”，反映出泰国长期以来面临的混乱局面。作者的主要论点是：泰国民主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这两派手中；民主要么残缺，要么被暂时抹杀。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崎坚持了泰国政治“基于代理的解释”（agency-based explanation）以及承载这些代理人的网络政治的重要性。此外，西崎的基本假设是，网络或王朝即政治家族不利于民主。既然如此，就说明适当的民主制度尚未建立。

这种说法让我想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有关泰国政治的大量文献，尤其是在他信首次担任总理期间和之后。无论是保守派学者阿奈·劳探玛塔（Anek Laothammatas），还是进步派学者帕素·蓬派吉（Pasuk Phongpaichit）和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以及卡贤·特加皮拉（Kasian Tejapira），都对所谓的政治家族、王朝和政治家持有类似观点。

基于上述主张，西崎提出另一个主要论点：不是泰国政治孕育出政治王朝或政治家族，而是根深蒂固的政治家族孕育出残缺腐朽的泰国民主现状。该论点与许多研究泰国政治学者的观点背道而驰，后者倾向认为政治王朝的兴盛得益于泰国政治结构和生态系统。西崎几乎是在说，这些政治家族才是“结构”本身，并孕育出整个泰国政治格局的生态系统。

西崎在反驳泰国政治观察家詹姆斯·奥基（James Ockey，2015 年）和布拉扎·贡吉拉底（Prajak Kongkirati，2016 年）时指出，这些家族出现于 1932 年泰国民主前夕，而非大多数人认为的 1973 年，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十分持久。当然，从 1932 年开始，人们就意识到有政治家族，但大多数学者声称这些家族主要在曼谷或中原地区，而非全国范围内（如布拉扎，2016 年）。西崎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这些家族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性网络的组成部分。

本书最明显也是最无可争议的贡献是它提供的信息。从葬礼纪念册（译者注：指在葬礼上分发给客人的纪念册，通常包括逝者的传记及其他文学资料）到资产负债申报账目等，这部作品收集的信息来源之多、信息量之大超乎想象。作者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提到，由于资料过多，本书可能会枯燥至极。在他看来，这一问题既是本书的缺点也是优点。我很赞同，丰富的资料是最大的闪光点，但它所造成的无聊远不是本书的致命弱点，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数据的广泛性很容易使这本书在未来数年里成为该主题的学术参考书。这些数据不仅在原始形式上保持良好，还让西崎的论点更具说服力。西崎在这部著作中的目标之一是证实政治家族的影响力是塑造泰国政治格局的核心因素。这一观点相悖于最近关于泰国选举政治的传统学术观点，后者认为说服选民的方式发生结构性变化：从“克里斯马型”转变为“纲领型”，通过庇护关系（clientelistic relationship）研究得出。（Viengrat，2022 年；2023 年）西崎虽然并不否认这种变化（原书第 xv 页），但他提出一个“基于代理的解释”，即

政治家族和网络政治仍然发挥着更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广泛接受的“政治家族”和“网络政治”仍是泰国选举政治的基础，庇护关系只是这种王朝生态系统的的一个子集（原书第 xvi 页）。

为了支持该说法，作者提供大量信息来证明政治家族“客观且不可否认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崎收集的有关泰国议会历史上 3454 名议员的信息将成为铁证，证明泰国政治家族在泰国民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泰国现代政治史上，他们在议会席位中所占比例不容小觑。西崎证明，近年来政治家族被过分淡化，其稳定性将迫使大多数泰国政治观察家，尤其是进步阵营，重新考虑他们对泰国选举结构变化和动态的主张。我相信，这一结果加上作者苦心收集的庞大信息量对学术界有着巨大贡献。

然而，如上所述，它也有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它没有提供太多原创性论据。二是作者太过执着于描绘“王朝家族”的特征，似乎忽略了实际影响和改变这些王朝的因素。三是作品缺乏适当的标准来支持其关于政治家族在泰国政治中十分重要的说法。四是该书非黑即白地将“王朝民主”等同于民主的衰落，过于简单化。

西崎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贡献，但了无新意，与作者本人精心收集和展示的大量信息毫不相干。西崎只是用他收集的数据告诉我们，政治家族确实存在，但他并没有详细阐述其意义。他提到王朝对民主不利，并解释为什么王公贵族和官僚家族针对资本主义平民的行为发动政变，但语焉不详。该书缺乏对原则和概念标准的讨论，无法解释政治家族为何不好或其存在为何重要。因此，所提论点在概念上几乎与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无关。

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概念框架，本书就无法证明政治家族的重要性。以维乍集瓦（Vejjajiva）家族为例，众所周知，阿披实·维乍集瓦（Abhisit Vejjajiva）和苏拉南·维乍集瓦（Suranand Vejjajiva）同姓，属于本著作定义的同一个“政治家族”，但两人的政治选择和政治道路却截然不同。相比之下，已解散的未来前进党（FFP），其许多成员都转投以塔纳通（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为中心的前进党（MFP）。两党的领导成员并不同姓，甚至没有婚姻关系，但其关系结构甚至政治功能却与西崎提到的一些政治家族如出一辙。因此，读完这本书后，我并没有看到一般政治家族相对于政治宗族的重要性。

其次，作者过分执着于王朝家族本身，对家族内部的变化及其功能视而不见。这与前一个缺点密切相关，正是因为作者只关注其形式，读者最终会怀疑政治家族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大家只知道存在由血缘或婚姻组成的政治家族，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其他的则一无所知。

事实上，政治家族依然存在，任何理智的泰国政治观察家都会同意这一说法。但是，它们也确实会改变自身角色。伊兰和维恩格拉特（Illan Nam & Viengrat Nethipo）（2022 年）研究了被称为泰国“政治家族大党”的泰爱泰党（TRT）的形成和功能。泰爱泰党所扮演的角色与西崎所认为自 1973 年以来的角色截然不同。两位作者证明，即使政治家族保持其形式不变，功能却在改变。家族必须根据 1997 年宪法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而改变，并变得更加纲领化。西那瓦（Shinawatra）家族可能会传承其权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泰爱泰党，但这不再是简单地通过买选票和利用每位议员的人格魅力来获得支持。这就是政治家族活力所在，西崎却因为痴迷于政治家族的静态形式而将其忽略。

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本书想要描绘来自政治家族“影响力的重要性”。西崎选择客观地呈现这些政治家族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就方法论而言很合理，但缺乏适当的概念标准来区分是否具有影响力。例如，西崎试图用 1973 年以后的传统知识来证明政治家族自 1932 年以来的长期影响力（原书第 7 页）。他首先声称，政治家族赢得的国会议员席位的平均比例为 41%。然后，他认为政治家族在议会中的影响力始于泰国民主的初期，在 1932-71 年间，24%的议员来自政治家族。这些数字低于平均比例 41%，而且没有标准来确定他们的影响力。作者没有从概念上阐述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某件事或某组信息具有影响力，比如“从获得 20% 的席位开始”。这几乎就像是要求读者自己去理解标准是什么，由于 41% 和 24% 相差悬殊，如果没有正确的概念标准，对影响的衡量就显得过于薄弱。

最后一点与前几点有关。西崎不仅太过执着于他所定义的政治家族，而且只关注其形式和延续，不关注其他相关问题。这一点贯穿整本书的始末，他将“王朝民主”等同于“民主的衰落”，非黑即白地简单化现实。西崎甚至认为，政治家族只追求个人利益，很可能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这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也许正确，但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尤其是从 1997 年开始。西崎本人也分享过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原书第 7 页）：从 1988 年到 2020 年，议会中的政治家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占据总席位 46.2%。可泰国不正是在这一时期经历着一波又一波最进步的民主进程吗？如果政治家族果真让民主恶化，那么这一时期的泰国本该经历严重的倒退。

无论如何，政治进步性并没有减弱，因为政治家族已经随着历史的动态发展而演变。它们并不像西崎所描绘的那样一成不变。维恩格拉特（2023 年）就捕捉到并清晰地描绘出了这种动态。当然，政治家族可能会在某些时候甚至大多数时候谋取私利，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多数派和民主的衰落。我个人为这一假设存在根本性缺陷。

除去以上四个不足，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西崎试图提出从 1932 年起全国范围内就存在政治家族，这有悖于常识。原则上，笔者赞同这一说法，并对作者的尝试表示赞赏。然而，作者得出这一结论的出发点存在问题，尤其是他在这场辩论中单单挑出布拉吉（2016 年）。首先，包括布拉吉在内的大多数相关著作都承认 1932-73 年间存在政治家族，只是他们认为这些家族大多在政治中心。西崎用大量资料证明这不对，他声称这些家族不仅存在于中央，而且遍布全国各地。可他对政治家族的定义与前人不同，因为他在其中加入了婚姻关系，这意味着他比前人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有鉴于此，他发现自泰国民主制度诞生以来，政治家族确实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许多关系似乎来自于旧精英政治家族与新兴政治家族之间的通婚（原书第 2 章）。他甚至认为这是 1932 年民主革命没有取得好结果的原因，因为精英阶层解体会给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推动者带来利益冲突。这本身是一个惊人而伟大的发现，但将其作为反驳前人的论据则相当难看，因为此前包括布拉吉(Prajak)在内的著作，都基于与西崎完全不同的定义来进行论证。他们的定义中没有包括通婚关系，西崎明明很清楚这一点，他自己在书里都指出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推荐这本书，因为瑕不掩瑜。仅收集数据这一艰苦工作就足以称得上是作者毕生的成就。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内，它都将是泰国议会政治的百科全书。

（英文原文见：Kritdikorn Wongswangpanich. Yoshinori Nishizaki. *Dynastic Democracy: Political Families in Thailan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22.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23, 12(2): 373-378）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主办期刊《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于 2023 年 4 月刊载了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政治科学学院院长普立·夫汶乍伦（Puli Fuwongcharoen）博士对《王朝民主：泰国的政治家族》一书的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2011 年，西崎义则以其开创性著作作为泰国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泰国的政治权威与省份认同：素攀武里府的形成》（*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rovincial Identity in Thailand: The Making of Banharn-buri*）。该书以班汉·西巴阿差（Banharn Silpa-archa）对素攀武里府（Suphan Buri Province）（又称 Banharn-buri）的统治为案例，研究了泰国农村政治家的崛起。西崎在素攀武里府进行长达七年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收集到大量数据，此本书见解独到，

引人入胜。十年后，他又完成另一部重要著作，有望成为任何对泰国现代政治感兴趣人士的重要参考资料：《王朝民主：泰国的政治家族》。

以素攀武里府案例（原书第 xii-xiii 页）为契机，西崎致力于揭示泰国自 1932 年革命至 2020 年 6 月南邦府补选期间“王朝民主”的演变过程，“王朝民主”被定义为“统治精英主要来自政治家族的一种民主子类型”（原书第 3 页）。他从世袭关系的角度重新解读泰国的政治历史，认为民主力量与军事专制主义之间看似无休止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类精英家族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这两类家族都扼杀了代议制民主：平民政治家族和与却克里王朝有联系的老牌上流社会家族”（原书第 xi 页）。西崎引用了一系列材料来佐证论点，从葬礼纪念册到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公开的个人资产记录，揭示出将众多政治人物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姻亲关系。在此过程中，他确定了 700 多个国家级政治宗族以及与之相关的国会议员，并图文并茂地展示这些宗族在政治格局中的交织和渗透程度。结果证实泰国应归类为王朝民主制国家，例如，在 2000 名当选议员中，有 41% 来自政治家族；同时也证实由于议会席位集中在范围较小的亲属网络中，“民主作为一种形式在泰国扎根越久，其代表性就越弱”。（原书第 11 页）

在论述两类精英家族之间的斗争时，西崎首先讨论 1932 年旧政权垮台后王公贵族和官僚家族的生存问题。他指出，结束绝对君主制的人大多来自这些家族，这导致他们做出妥协，最终使 1932 年前国家的家族特征得以持续并渗入新政权（原书第二章）。随后，当保守派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卷土重来时，家族关系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其能够很快演变成一个强大的君主网络（原书第三章）。尽管成员人数不多，但网络中的许多人来自王公贵族和官僚家族，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他们已成为平民家庭育出政治家的阻力。由于拥有枪支和拉票员等重要资源，后者通过选举在政治体制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主导地位从而直接威胁前者，而前者往往会采取破坏性和非民主对策。这就形成泰国独特的王朝民主，在选举王朝主义和军事独裁主义之间交替出现（原书第六章）。

《王朝民主》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西崎通过以家族为基础的范式重新诠释整个泰国现代政治史，这一努力令人钦佩，打破了长期以来影响我们理解泰国政治动态的方法的有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著作作为泰国研究领域注入一股新鲜空气。该书另一个优点是，它的成书是基于迄今为止收集到的有关泰国政治家族最大且最全面的数据库。因此，该书今后应能为无数学者服务，成为有关泰国各种显赫家族，从班雅拉春（Panyarachuns）和沙拉辛

(Sarasins) 等老牌家族到奇触 (Chidchobs)、布拉努帕孔 (Buranupakons) 和哈恩萨瓦 (Harnsawats) 等新兴家族家谱信息的宝贵资料来源。

尽管本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该书使用一些关键术语时含糊不清,像“平民-资本主义家族”;而对“政治家族”(原书第 4 页)和“官僚家族”(原书第 18 页)的定义过于宽泛,尤其是在时间范围方面。另一个不足是,当他试图证明推翻绝对君主制的人是“犹豫不决、温吞的革命者”(原书第 83-84 页),由于他们是守旧家族的一员,他只是简单地概述了当时将他们与众多王子和保皇党人物联系在一起亲属关系网络,但这不足以支持此说法。西崎并未证明家族关系如何转化为对政治对手的同情。他们碰巧是亲戚,但众所周知,相关性和因果关系是两码事。还有一些历史细节与西崎所持论点相悖,但书中却没有提及。例如,他没有解释博沃拉德叛乱 (Bowaradet rebellion) 后的政治压迫或巴差提朴 (Prajadhipok, 译者注:拉玛七世) 国王的退位如何与他关于新政权领导人宽大为怀的论点相吻合。最后,除去在主要章节中详细讨论过几十个有影响力的家族外,该书没有在附录中提供详细的数据库,甚至没有提供已确认的政治家族及其担任公职的成员名单。

(英文原文见: Fuwongcharoen, Puli.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45, no. 1 (2023): 135–37.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211199>.)

策划、校对: 尹一凡

编译: 杜薇

统筹审校: 东南亚组